

1945年8月一隅

□徐 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消息从鲁中军区机要科传出，在鲁中党、政、军、民机关、部队飞快地传播着，沂水县城西南姚家店子一带的山村沸腾起来，人人奔走相告。有一位同志把一个铜制的洗脸盆拿起来当作锣，用一根木棍敲打着铜盆，从这村到那村，边跑边喊：“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的两位女同志听到这消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紧得手指甲扎破了皮肤，出血了，还都乐呵呵地笑着。

鲁中的机关人员，大多数都经过艰苦卓绝、险象丛生的1941年和1942年。1942年党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指出：“熬过明年两年，这一难关渡过，胜利就在前面。”大家响应党的号召，紧紧抱成一团坚持苦斗，充满信心地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最后能这么快就取得了胜利，大家都感到意外地惊喜。

八路军山东军区命令：鲁中的部队为第一路反攻大军；所属的部队，整编为山东八路军第三师、第四师，以及警备一旅、二旅、三旅、四旅。总兵力近4万人。8月18日召开大会，誓师出征，收复失地。新华社鲁中分社派我随军采访。四万威武雄壮的健儿、十万民兵和担任后勤任务的民工，都走在阳光灿烂的大路上。过去大多数行动，为了出敌不意，隐蔽地行军，以避免敌人的锋芒，或是去歼灭敌人。而今，以行军纵队的队形，意气风发地在大路上进军。沿途父老妇孺单食壶浆，欢声笑语，迎送子弟兵去赶走日本鬼子！八路军的劲儿被鼓得足足的，队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胶济、津浦沿线的敌占城、镇前进。

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想象不到在7年多前这支队伍的雏形是啥样。只有极少数人依稀记得：1938年1月1日，乘着日寇在1937年12月27日占领济南市，31日占领泰安县城，日伪立足未稳，乘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韩复榘部十万大军不战而逃，散兵所到处，翻箱倒柜财物被洗劫一空，百姓怨声载道时，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省委书记黎玉带着160余人，在泰安县东南的徂徕山上举行武

装起义，打出抗日救亡的旗帜，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其中有一些省委的工作人员，刚出狱的共产党员，从延安来的两名红军干部，从北平、天津、济南流亡的一些学生、平、津、济民族解放先锋队（党的外围组织）队员，民众抗日自卫团团员和妇女救国会会员等。这支部队胸怀远大理想，抗日热情高昂，可是其貌不扬，有的穿长袍，有的学生装、农民装，还有穿西服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枪，有的还是土造枪和打不响的破枪。

就是这样一支不显眼的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泰山地区和沂蒙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在千百次的战斗中锻炼成长、壮大，成为具有四万官兵的劲军。起义时用的破枪早就淘汰了，反攻大军所用的武器装备，都是在战争中缴获日伪军的，大多是洋枪、洋炮。最多的是捷克式的机枪、步枪，也有俄、德、法国的枪、炮，日本造的三八式大盖枪、歪把子轻机枪、九二重机枪、迫击炮，这些都是鲁中军队装备的亮点。

最耀眼的是鲁中军区山炮排，有一溜大洋马迈着大步向前走，第一匹最大的洋马驮山炮炮筒，后面的马分别驮炮车轮、炮车架、炮车档。这门山炮原是扫荡我根据地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三大队（草野清大队）的。1944年9月，在沂水县城西北葛庄一带，草野清大队被鲁中八路军围歼，300多人被击毙，30多人被俘虏。战斗中，一团三连三排副排长战斗英雄侯长俊瞥见几个日本兵正在沂河岸边拆卸破坏这门大炮，他眼疾手快，一纵身捡起一把敌人的指挥刀，又一个健步跳过去，用指挥刀砍倒了三个敌人，缴获了这门“四一式”山炮。第二年，即1945年3月攻打蒙阴县城时，用这门炮对准守西城门的日军，连发三炮，轰击得日军胆战心惊。我军尖刀连突击队迅速架好云梯登上西城门楼，消灭了敌人。我反攻大军将要用这门大炮轰击拒不投降缴械的敌人。

在第一路反攻大军指挥部行军纵队的后面，突然扬起了一片飞尘，一溜骑马

人快马扬鞭疾行，直到见了指挥部指挥王建安才勒马缓行。是山东军区又有了新的命令：为准备接收济南，山东军区命令成立“济南前线总指挥部”，肖华任总指挥兼政委，王建安任副指挥，罗舜初任副政委。随肖华前来的有一个前线记者团，由山东大众日报社副总编陈冰任团长，陈冰策马到我旁边，对我说：“你现在离队，跟随济南市委的同志走，你的任务是采访济南地下军起义的事迹。”我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毛泽东主席在8月9日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曾指出：“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我想再听陈冰向我提示一点采访线索，可是他二话不说就走了。我跟济南市委的同志到了济南市附近的仲宫镇，进了一个深宅大院，安排我在一个小旁院的房内住下。

在济南前线总指挥部指挥下，各部队进展迅速，捷报频传。19日解放临朐县城，22日解放益都县城和青州车站，23日解放莱芜县城、博山县城，25日解放淄川县城、章丘县城，28日解放周村。随后，切断了胶济铁路西段、津浦铁路大汶口至济南段，逼近了济南市。”

我反攻大军所到之处，群众欢呼报仇雪耻，迎接解放，一派新的气象。

可是我在这一周间，却像坐“禁闭”似的，只能在空荡荡的屋里和小院中徘徊。直到月底，济南市委的同志才对我说：“国民党已和日伪合流，控制了大城市。目前我们接管济南市，组织地下军起义，都是不可能的事。你回去吧，现在前线指挥部在博山城里。”

从仲宫到博山县城有100多里路，都是山路，过了一山又一山。快到中午，走到一个峡谷里，峡谷两边都是在阳光下闪动金灿灿绿叶的青纱帐，高粱、谷子刚吐出穗子，玉米的棒子长得很丰满，吐出紫白相间的穗子在秋风中飘拂，峡谷中的河水清冽晶莹，河床中的鹅卵石有橙红、黄、褐、黑、乳白，五彩斑斓。我蹑过河水，在草地上歇息，仰望天空，湛蓝明净，阳光明亮而温暖，周围的群山青青，天上

地上都寂静无声，从河的上游偶尔传来“哗！哗！哗！”的搓衣声。我躺在草地上，解开军衣的扣子，让温和的风吹拂我的肌肤。我想：多年来，我唱着、写着：“自由、解放”；“最后胜利属于我们”；“赶走日本鬼子享太平”。现在我过的也许是自由的、和平的，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日子。突然我的脑子闪过3个月前的一幕：我在沂南县采访反扫荡，敌人撤退前，在沂汶区汶河南岸朱家李庄，放了无数团大火，朱家李庄是有名的抗属村，有160多户抗日军人家属，敌人恨之入骨，用烧光政策毁灭这个村庄。我到这庄时，人们都忙于救火。东街一户朝北的大门半开着，我顺手推开门，触目惊心看到锅屋的门框上吊着一个中年女尸，急转身四下环顾，北屋、西屋都烧得只剩下被烟熏黑的屋框，里面还飘着余烟，天井里的水缸、盆、罐被砸得稀碎，屋里的几个盛粮食的小坛子也砸碎了，少量的黄豆、高粱、绿豆滚成一片。我回想那僵硬的女尸：“是抗属吗？”“为什么？”我不愿再想下去，现场的一切分明是一群无恶不作

的兽兵所做出的暴行，我心痛得几乎喊出声：“永远也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大约晚上七八点钟，我走到博山县城南的山岗上。一条孝妇河把博山城区分为两片，东片是博山城区，西片叫“四十亩地”，是日军建筑的守备和居住的地方。此时，万家点上电灯，城区灯光辉煌，连孝妇河的流水也闪烁着灯光反射的荧光。我兴奋地迈着大步下山，7年了，因为经费的限制，只能熬夜捻细小的节油灯，我们报人是要熬夜工作的，但也是点省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灯光辉煌，也应该是胜利的象征。我找到前线记者团的住地，在院落就听到厅里传出悦耳的钢琴声。我进入客厅，怔住了：是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前线反攻大军总指挥上将肖华，在聚精会神地弹钢琴，肖华在军中是年青干练、文武双全的首长，他是从少年起就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学习、锻炼出来的英才，而且多才多艺，写诗文作歌词蛮好，弹钢琴也是颇有水平的。现在，接管济南的任务他放下了，有闲暇练此弹琴，可是将有很重的担子担在他的双肩，他将跟着罗荣桓元帅，带领山东的6万多八路军健儿到东北去，一路走水路，从胶东经渤海到辽东，一路从冀鲁边过长城到热河、辽宁……去收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14年的白山、黑水、城市、村庄和地下的宝藏……

何继善的儿时逃难地图

□余 艳

母亲是听了太多类似孩子被炮火吓哭而暴露目标的故事，母亲用手活活扼死襁褓里的婴儿，或是用毛巾堵着两岁多的幼儿直到气绝人亡也不松手。那些母亲呀，都是一个个“死脑筋”：让孩子死在自己怀里，也比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强……

我那时已经5岁，可母亲还是怕，随时准备着。而我在那段时间不发一点声，似乎是操练着：遇险遭难时，再害怕都决不出声。那一段啊，我几乎把自己憋成了哑巴。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们啊，就是用这种“残忍”，守住了“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尊严。

树林里小黑板上写着“还我河山”

千辛万苦到了新田，父亲为安抚我幼小的受伤的心，赶紧找了学校。我所就读的学校，老师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交一张大字和一张小字作为家庭作业，写得好的，先生便用图画一个圈。在此激励下，我的字越写越好，圈也越画越多。

没想，安定了半年，新田也遭空袭。有几次，空袭紧逼而来，我们还来不及撤离教室，就响起了“紧急警报”，老师只好让我们就地躺在课桌下。巨大的轰鸣声、惨烈的爆炸声忽近忽远，很多女同学被吓得哭起来。憋屈在课桌下是多么的无奈无助，每一分一秒都是那么的漫长，恐惧、紧张，憋屈，我们都能听到自己愤怒的心跳。

空袭过后，一旦我们从桌下站起来，那位饱受屈辱的语文老师，一位忠贞的爱国者，都会在黑板上学着岳飞的字体奋笔疾书，写下“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那以后，老师每次上课前，总喜欢在黑板上用粉笔题上一首诗或几个字。连躲到树林里，挂在树上的小黑板，他写下最多的、也是最令我难忘的，还是“还我河山”这四个字。

后来结合对书法的爱好，我不停地写小时候不知写了多少遍的那几个字——“还我河山”，这四个字几乎写了一生！

走啊走，那漫长的逃难路……

原以为新田安全，但随着“日本鬼子就要来了”的传言，我们一家又往郴州方向逃难。几百公里啊，鞋都走烂好几双。逃难真的苦！那种艰难，还不是苦那么简单的事，是盲目，不知道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听说日本鬼子到哪里了，就往相反的方向去。

这次逃难，走得比较远，从新田出发，经过嘉禾、临武，到达宜章，然后到了大山下面的瑶岗仙。这里距新田有300多华里，我们步行了七八天才到。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啊，也不知怎么走下来的……

幸亏，那时候的老百姓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住到素不相识的老家乡。看到难民来了，他们都同情地让地方，常常是把他们的堂屋让出来。我们都带着被包，被包的外层包着不容易透水的“油布”，把油布往地上一摊，铺上被子就睡觉。而且老乡还允许在他

我上学时，还不满5周岁。母亲为使我避读日语，让我进了教会办的学校。我天生爱读书不贪玩，成绩自然是很好的，并因此当上了班长。班长负责收发全班同学的作业，课前需要喊“起立、行礼、坐下”，放学时则要领同学们到校门外，喊“同学再见”后，大家各自回家……任务一点不重。但有一天，“重任”却突然落在了我身上。

那是升入高小五年级时，正是“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宪兵司令部肆无忌惮地干涉教会学校，“规定”一律学日语。学校师生都抵制这个“规定”。日本鬼子野蛮地撤了校长的职。后来的校长胆子小得不敢多说一句活。派来教日语的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子，细眉细眼的脸上倒是整日地堆满了笑，一副“中日亲善”的面孔。那时，新学期刚刚开学，日本女子却兴冲冲地把我叫到我的屋子里，满面假笑地说：“日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国小孩子应该从小就知道，好好学日语吧。我们一起来准备开一个故事会吧。”

面对这样一个柔声气然而又很虚假的日本女子，我一时间心里很急，但不知怎样应答才对。忽然急中生智，我像个大人似的端坐着，昂着头，有板有眼地说：“我们是教会学校，学校的事由外国神父主持。学日语，他们并不赞成。现在要开日语故事会，是经过外国神父同意的吗？我们这些天天跟大人一起看报的小孩子，都知道那时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开始反攻，日本已处于不利地位。我这个小孩子的话恰恰说到了她的痛处。这个能说会道的日本女子竟蹙紧眉头沉默了许久。我马上说：“其实，开个故事会还是蛮好的。日本儿童、中国儿童，乃至世界各国儿童中，都有很好听、很动人的表现英雄精神的故事呢。我们就来开一个朗读各国文学名著中表现儿童英雄精神故事的会吧。”

于是，我就表现得很主动。为了让她“放心”，我又问她，关于日本儿童的故事是否由她亲自选定？是否邀请日本军官来讲？她轻声地说：“日本的故事我来选吧。我真是十分愿意参与你们的活动。”现在，又轮到我不“放心”了：她会选什么样的故事？她是否会选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的故事？这时，她又加了一句：“只是，主持这个故事会，应该日文、中文并用，表示‘日中亲善’，也表现同学们学日语的成绩。又正好请司令部长官来为学习日语优秀者颁奖。谁能获得前三名，日军司令部将推举他们到日本学习。这是轻易得不到的机会啊。”说着，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摸摸我的头发，显出一格格外亲热的样子。

开故事会那天，天气晴朗。为了让更多的人参加，也为了更加“安全”，会场就设在学校的操场上。外国神父与日本长官、英语教师与日本女子并排坐着。教会保镖与鬼子卫兵、日本军士与地方保安，一列列阵。便衣特工与伪职人员、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随意坐下。熙熙攘攘，叽叽喳喳，好一番“亲善”，好一派“共荣”。

准时开会。年级里日语说得最好的那位女同学准时出现在砖砌的台子上。和她站在一起的，是年级里日语说得最流利的一位男同学，他的父亲曾留学日本，原本在师范学校教数学，日军进城之后，强令他当了翻译。

一开头，两位男同学分别用国语朗读了三国时17岁的孙坚独自一人智驱乌海盗的故事和南宋岳云12岁随父亲岳飞抗金，收复随州时最早登城、颍昌大战中首先冲锋的故事。接着就要由那位日语说得最流利的男同学来朗读由日本女子亲自选定的日本明治天皇的少年故事了。这位男同学从日本女字手中接过了一个寄自日本东京的印刷品邮件，里面装着一本过去年代出版的书。那是一本夹杂了很多手写体汉字的书，而我们中国小学生还没有学过如此“深奥”的日文。由于邮寄时间长，日本女子还没有来得及看这本书。这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现在，用印刷体日文字母重写一遍是不行了。鬼子长官事先没有准备，自然也无法上台来讲。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她自己上台来读也觉得不妥当。只得临时取消了。这时有一位同学举手说，他可以用国语朗读一篇日本作家德永直写的儿童故事《马》。德永直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进步作家。日本女子一听这个名字，脸色就有点不好。可这是一篇日本儿童故事啊，她也不好阻挡。《马》讲的是一对小兄弟，因父亲病倒，深夜时装了满满一车冰镇的鱼，要赶在天亮以前送到五十几里外的植木镇。拉车的是一匹枣红色的小马。夜空漆黑，又下起雨来。天很冷，狭窄、陡急的路泥泞打滑。人、马、车，都陷在了泥里。兄弟俩哭了，马的眼睛里也满是眼泪。但他们一起尽力、坚持，终于得到也是去植木的伙伴的帮助，翻过了陡坡。这位同学读完故事时也已泪流满面。日本儿童面对困难时的坚强、坚韧、令人感动。我看到，会场上大人小孩都在拿手帕擦眼睛。这时，那位日文学得最好的男同学走上台，用日文将这个故事又讲了一遍。

故事会要结束了。我们问那位年纪轻轻日本女同学，他们的长官是不是按原先的计划上台来颁奖呢？她摇了摇头，说：“长官有事，已经提前回去了。”但在所有的大人全部退出会场之后，她还是拿出一个上面印着膏药旗的盒子，郑重其事地递给了那位说日语的男同学，说：“愿你继续努力，把日语学得更好。”大家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面膏药旗。一张信笺上，用毛笔正楷工整地写着“让这面旗帜高高飘扬”9个汉字。我们恨不得立即撕掉它。一个男同学郑重其事地说：“看这面旗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飘’和‘扬’？那时，全班人一起，一条一条撕碎它！”

这次故事会以后，这个年轻的日本女子竟不见了。有一位看上去40多岁的日本女人接替了她，当日文教师，还当“日语会话”和“日中亲善”的课外指导。她似乎比那位日本女老到许多、稳重许多。见了我们并不多说什么，更不问什么，只是微微地笑一下。但在“课业”上，则是分外的“严格”、“绝对的”“严厉”。开学第二天，她叫我到办公室，用很流畅的汉语对我说：第一，上日语课喊“起立、行礼、坐下”时要用日语；第二，告知全班同学，上日语课任何人不得缺席；第三，在校外，遇到她或见到日本哨兵，一律鞠躬并用日语问候。

在中国小孩子的脑子里，对抗鬼子、击败阴谋的办法，一定有的。先看我们的教室，每个学生都有固定的座位，每一节课上，谁来了谁没有来，一眼就能看清楚。于是，我在点名时就会很自然地略去“不来者”的名字；并且在上课前，把空着的课桌、椅子搬到教室外的墙后暂时“隐蔽”，又把那几个空出的位置填补、挪腾得没一点异样。

当时，这座小城到处都是鬼子兵，我们学校所在那条弄口有一处鬼子的机关，不但日夜设有岗哨，而且哨兵总是亮出长枪一端的刺刀，又总是牵着一条歪着头、吐着舌头的狼狗。每次放学，我照样站到全班同学的前面，领着大家走到距弄口有几百米远的南北横竖交叉的桥头上去，我就会及时地响亮地喊一声“同学，再见！”大家就各自向东向西，不走大路，就穿小街，避开鬼子机关，绕过日军哨兵。天天如此。直到我们高小毕业，抗日战争胜利，我们班所有同学没有一人向鬼子兵弯过腰。于是，这第三项“指令”也被我们取消掉了。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约莫在一个星期之后，正是月初，日本女人上完课，大声地对大家说：“从今天开始，放学的队伍走到弄口再散去。一来让站岗的哨兵逐渐地熟悉大家，使‘日中亲善’具体化；二来也使中国小同学能够在日常中表达对日军的尊敬之心，能更好打‘东亚共荣’的基础。”我回应说：“桥头是小城四面交通的重要道口，放学后走到桥头互道再见，是多少年来形成的惯例。我不能违背这个‘惯例’，否则会受到校方的处罚和长辈的责备。”日本女人显得很不耐烦，说：“我不是来跟你们商量，我是来通知你执行。”我们还是找各种借口，然后一起走出了教室。

第二天，不见了这个日本女人。是不是德国投降以后，日军见大势已去，已经无“威”可逞，无“风”可刮？走出学校大门时，我们仍像往日一样，合着步伐，唱着那支很抒情、很动听的放学歌。当我们走上桥头，亮着嗓子说着“同学，再见！”时，我们这些小孩子的眼眶都湿润了。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虽然还不能完全说清楚“热爱祖国”的全部内涵，却已经能够完全完全地说出“打倒帝国主义”的深切意愿。

我们的反抗

□张锦怡

今年5月31日，“六·一”儿童节前夕。有“科普院士”美誉的何继善，用半个多月时间精心为120个小记者每人准备三件礼物：亲自编排课件讲一堂生动的科普课；给每个小朋友亲手写一幅励志书法；给每个孩子送一本自己翻译的《虎口拔牙》。那天，何继善意味深长地说：“我儿时的颠沛流离、失学逃难已经一去不复返。真希望他们健康成长。”且听他讲述自己的儿时逃难经历。

反方向跑躲过炸弹，捡一条命

我1934年出生在湖南浏阳普迹。从四五岁时，就开始离家逃难。

5岁的孩子贪玩。白天没有枪声炮声，几个邻居家的小伙伴又喊着跑出去了。那天，我们玩山村版游戏，大大的晒谷坪上你追我躲，玩得正尽兴，突然，天上传来轰鸣声，“日本飞机来了！”

我们本能地往家的方向跑。“呜——呜——”伴着魔鬼般的巨大声响，刚听到轰鸣声，三架飞机一下就到了我们头顶。只见那飞机在空中盘旋一阵，就向地面上的我们俯冲过来。

“反方向跑……掉过头，反着跑，快跑……”突然，一个大孩子冲我们喊。

我们听了他的，掉过头往离家相反的方向没命地跑。“轰——”的一声巨响，我们全被炸倒……“完了，我死了……”当时，昏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一阵过去，我动了动，头上身上全盖着厚厚的土。再摇摇土，我还活着？吃力地睁开眼，迷迷糊糊眼里有沙，看着身边前后几个小伙伴，像被拉出去活埋，却又从土坑里钻出来一样，他们满脸的惊恐加浑身上下厚厚的黄土。我赶紧爬起来，往身后看：天呢，身后是一个巨大的坑！坑里，厚厚的弹片到处都是。如果不是大哥哥喊住我们，这离我们30米不到的弹坑就是埋葬我们的坟场！5岁的孩子，那一刻的第一感觉不是害怕，是憋屈，是愤恨。

誓死不当亡国奴

从我们几个孩子差点被炸死，几个家庭就想着要躲进山里去。加之镇上不断有四处逃难的人经过，带来更恐怖的关于日本鬼子的传言，坚定了大家要逃难的决心。家家户户在一片慌乱中打点行李、清理财物，基本是将值钱的东西弄成一担，随身挑走。

当时为什么要逃难，有句流行特广、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话，就是：“誓死不当亡国奴！”那时的中国人，宁可逃到很艰苦、很稀疏的地方，逃到生活很困难的地方，也不愿看着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再做亡国奴。我姨父姨妈逃到广西，生活极其困难，特别是我姨妈生病了，就差点死在广西。难民生活是非常悲惨的，但所有人都坚守“誓死不当亡国奴”之信念。

那些天，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细节。

因为怕日本鬼子随时会闯来，母亲们在一起总是悄悄地说着什么，还不让我们小孩知道。不久，我就发现我的母亲裤子里口袋里鼓鼓囊囊，还时常掉了魂似的摸摸，生怕在疾走时弄丢了。母亲神神秘秘不让我看见，可我知道，那是一块小毛巾或干净布，是遇万一堵我嘴用的。